

书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刘绍颖

影响我的书

我的书架上并排放着两本《青春之歌》。一本是2005年印刷的旧书，纸张有些折痕，书脊处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贴过。扉页上留着20年前我工工整整写下的记录——“购于2006年3月”。那年，我还是一个初涉文学的大学生，坐着公交车从大学城穿过半个西安，在书店买到了这本重印的长篇小说。另一本是崭新的，是一个毕业学员送我的礼物。扉页上有一行字：“林道静的青春是革命的青春，我们的青春是强军的青春！”两本书之间，隔着的是时光，连着的是传承。

其实，我与《青春之歌》的缘分，远比买这本书更早。上中学时，我从同学那里借来这本书，课间偷偷翻开就再也放不下了。林道静逃婚、卢嘉川牺牲、江华在雨中告别……那些情节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多年后，我才懂得那份吸引里藏着的，正是一个少年对理想人格的最初向往。杨沫以自身经历为蓝本，讲述了林道静的故事：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少女，为反抗养母包办婚姻逃出家门。个人的不幸、时局的动荡，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使她逐渐觉醒。在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引导下，她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喜欢读书，头脑中总像在渴望望着什么——我渴望过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渴望过一种崇高而有意义的生活。但得不到它，我深深感受到灵魂的饥渴。”这句话曾让我在深夜反复咀嚼，那种不甘于平庸的灵魂饥渴，击中了一个少年的心。当时，我尚不懂何为“成长叙事”，也不明白林道静的形象如何承接了五四以来“出走”主题的传统——从娜拉到子君，从觉慧到林道静，一代代青年在“出走”中寻找自我与时代的连接点。我只是朴素地被感动着，似有一颗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心里。

多年后，当我研究生毕业面临人生的岔路口时，那颗种子悄然发芽。工作抉择的迷茫中，我反复翻看《青春之歌》，翻到林道静入党时的场景：“‘从今天起，我将把我整个的生命无条件地交给党，交给世界上最伟大崇高的事业……’”她的低低的刚刚可以听到的声音说到这里再也不能继续下



青春之歌(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侯一民作

去，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杨沫在谈到创作初衷时说：“只有跟着党走，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一个人才有开阔的胸襟和巨大的生命力。”那一刻，我意识到林道静的“成长”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改变，更是一种主体性的重构——从追求个人解放的“小我”，到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大我”。这种转变在小说中有清晰的逻辑：卢嘉川为她打开思想的窗户，江华引导她走向实践的道路，而监狱的淬炼最终完成了她信仰的确立。那些年的感性认知，在这一刻升华为理性选择。我毅然选择进入军校，成为一名文职教员。

刚站上讲台那年，有一次学员分享读书心得，我问：“你们听说过林道静吗？”教室里一片沉默。我心里涌上一阵失落，于是我给她讲了《青春之歌》的故事。从“小我”到“大我”，从追求个人解放到投身民族解放，从彷徨到坚定——林道静走出的这条道路，不正是千千万万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道路吗？下课铃响的时候，教室里静了一瞬，然后响起掌声。

那之后，我把《青春之歌》列入推荐书目。讨论中，学员们的解读常给我惊

喜。有个学员说：“林道静有点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又有点像《家》里的觉慧，但她比他们更勇敢，因为她走出了自己的路。”另一个学员说：“卢嘉川牺牲前写给林道静的那封信，让我想起了赵一曼烈士写给儿子的遗书。原来真正的信仰，是可以让人含笑赴死的。”还有一个学员说：“我理解了，为什么林道静在遇到卢嘉川、江华之后，就不再是那个柔弱的女学生了。因为有信仰的人，是有根的。”听着这些年轻人的发言，我想起多年前的自己。那时候读《青春之歌》，读的是故事、是人物、是激情；后来再读，读的是历史、是道路、是选择；如今重读，读的是育人、是传承、是责任。一部好的作品，是会随着读者的不断成长而愈加深刻的。

去基层部队调研的过往中，我有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我站在烈士王成龙的雕塑前。王成龙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员，为救战友壮烈牺牲，年仅23岁。我听着身边他曾经的战友对他的怀念，想起了很多人，其中就有卢嘉川——那个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那个在生死之际还在写信安慰同志的革命者。阳光照在王成

龙雕像年轻的面孔上，和卢嘉川在我心里的样子重叠在一起——同样的青春年华，同样的义无反顾，同样把“更多人”放在了“自己”前面。

另一次，是遇见我曾教过的女学员。她如今已是驻守边疆的中尉，一见面就熟络地跟我聊个没完，聊当年学校的故事，聊当下的生活。聊了半晌，她忽然问：“教员，您还记得那年您给我推荐的那本书吗？”我摇摇头。“《青春之歌》。”她接着说，“您说，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为自己活，那太亏了；如果能让更多的人活，那才叫不虚此生。我当时不懂，现在……”她没说完，回头冲我一笑，笑容里有风沙磨出来的粗糙，还有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的踏实。我已记不清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我相信我说过——因为那正是我从《青春之歌》里读懂的。杨沫用林道静的一生告诉我们：青春之所以美好，不是因为它属于个人，而是因为它可以融入一个更大的事业。临别前，她送给我一本新的《青春之歌》，就是现在并排放在我书架上的那一本。

有人问我：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让年轻学员读几十年前的小说，还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只要青春还在，只要选择还在，只要信仰还在，林道静就不会过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如何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如何在诱惑面前守住底线，如何在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问题，林道静面对过，卢嘉川面对过，江华面对过，今天的青年军人同样要面对。《青春之歌》不能替他们回答，但它可以让他们看到，几十年前的一群年轻人，曾经怎样回答过同样的问题。

《青春之歌》没有写林道静的后来。但我常常想，如果她看着今天一代代青年沿着她走过的路继续前行，看着无数后来者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她当年忠心向党的选择，她一定会欣慰地微笑。就像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时，心里涌起的那份感动一样。书中的青春是战火中的青春，当代军校学员的青春是强军征程上的青春。时代主题不同，但那种将个人选择融入国家命运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他们正在书写的，是属于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作家与作品

年初，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军旅作家柳建伟推出了一部全新散文集《半生杂谈》(河南文艺出版社)。我与柳建伟相识多年，素来喜爱并敬重他的创作。他的创作以军事题材见长，一部《突出重围》曾被搬上荧屏热播；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英雄时代》《钱塘两岸》底蕴深厚；长篇报告文学《日出东方》《纵横天下》等气势磅礴。

散文集《半生杂谈》分为“读书论人”“学思悟道”“边走边想”三部分，书中既有作者与何启治、周大新、朱向前等文坛挚友的交往往事，也有深耕创作几十年的心得感悟，还有游历眉山、临安、长治等地的触景生情之作。掩卷沉思，书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作家一以贯之的时代责任感。

谈及文学创作，柳建伟始终围绕着一个主要命题：怎样认识和描绘伟大时代。他的“时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便是对这一命题的生动作答。他坚信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活力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理应诞生出能够载入史册的精品佳作。他主张将时代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中观察，在社会基本形态与人类精神面貌的维度上，与古今中外的大变革时代进行对比。在这种宏观把握的基础上，再去观照具体的生活境遇，实现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的有机结合。

正是因为柳建伟怀揣着这份深沉的时代责任感，他看问题的角度、创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都变得更加宏阔高远。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家国情怀，应成为文学创作永恒的正音主旋律。在他看来，厘清何为中国文艺的正音主旋律，深刻剖析中国文艺发展的历程，对每一位作家而言都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期，文学能否真正服务时代、反映时代、讴歌时代、激励时代，是摆在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文学创作者面前的重要命题，更是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

柳建伟认为，文学必须做到为时代鼓与呼、为人民鼓与呼。文学的源头与本质，从来不是个人际遇里的杯水风波，不能局限于一己悲欢，倘若只是书写小我情绪、私人琐碎，便会扭曲中国文艺应有的价值与使命。以家国为根、以情怀为魂，以表现国家大事、抒发家国情怀为正音主旋律，是文学创作的正道。众多优秀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流传百世，是因为它们在民族最需要的时刻，以目光如炬的洞察、笔锋如刀的力量，呐喊呼号、直抵人心，将时代精神与民族风骨书写得淋漓尽致。文学艺术的价值，便是引导人类向善、向美、最终推动人类走向精神的完善与升华。

基于此，柳建伟在书中还谈道：如今我们讨论家国情怀在文艺中的重要性，非但不早，反而迫在眉睫。当下社会，文艺界也存在少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使得本应在中国文艺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家国情怀主旋律还显得有些不够明晰强大，这是违背文学初心与时代使

一以贯之的时代责任感

■马达

命的。当今中国文艺，必须寻回初心、牢记使命，让家国情怀的正音主旋律高昂唱响，不断创造和攀登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一个个高峰。

纵观古今，那些分量厚重、打动人心的作品背后，总是站着一位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的作家。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脉络，便可见一斑。柳青的《创业史》，深入刻画20世纪中期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着重表现这一进程中社会的、人的思想和心理变化，为那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吴强的《红日》，以宏大叙事展现解放战争的波澜壮阔；《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林海雪原》《艳阳天》《凯旋在子夜》《高山下的花环》《历史的天空》，这些作品都扎根于时代，饱含着作家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柳建伟在书中提及的周大新、朱向前、朱秀海等作家，同样是以责任感为笔，书写时代、记录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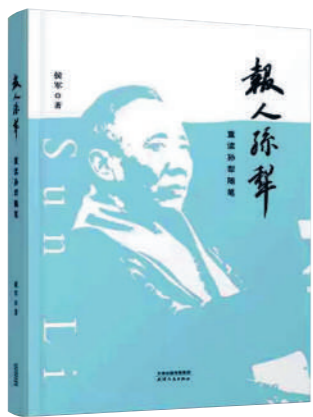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作家的时代责任感，是衡量一部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尺，也是决定文学前途与命运的关键。它要求作家站在时代潮头，正视历史，观察社会，肩负起应有的责任担当。柳建伟的《半生杂谈》不仅是一部个人创作心得集，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学宣言。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文学创作，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的文字游戏，而是心怀家国、肩担道义的神圣使命。这份可贵的时代责任感，值得每一位文学创作者深思与践行。

重塑孙犁的另一面

——《报人孙犁》创作谈

■侯军

创作心语



我是1977年调进《天津日报》当记者的，那时孙犁先生刚刚恢复编委之职，我有幸与他在同一家报社供职。1984年，我受报社委派，创办《报告文学》专版。机缘巧合，当时的《天津日报》重新发表了几篇孙犁写于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原来，孙犁早曾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战地记者，经常冒着连天炮火深入采访。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

读得多了，我就想写篇文章，我草拟了一篇关于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研究的论文提纲，想请孙老过目，就给孙老写了一封信。两天后，孙老回信了。孙老在信中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愉快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

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关于你在这封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希望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广泛阅读材料，然后细心判断，写出这篇研究文章。这对我来说，也是会有教益的。”

这封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如果从这次与孙老通信的时间算起，我萌生研究“报人孙犁”的初心，至今已有40年了；我的这篇论文《浅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阳刚之美》，发表于1988年，算起来也有38年。

1991年，孙犁的新闻学专著《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一书被重新发现，我立即向单位领导申领了这本书的研究课题，集中时间和精力，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这篇文章正面论述了孙犁作为一个报人的理论和实践，为后来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一个基础——这篇文章发表后，孙犁先生立即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予以首肯和称许。这使我的研究课题，从学理上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不过，因为我在1993年初南下深圳，重新创业，实在无暇他顾，这个课题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孙老辞世，这个夙愿一直未能完成。促使我加速成书的直接动因，是2022年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联合举办“孙犁副刊编辑奖”获奖者征文。受两家主办方的委托，我在征文结束时写了一篇“收官之作”——《孙犁缘是副刊人》。就在秉笔为文之际，我忽然感到一丝愧疚，想到了埋藏心底几十年的夙愿，想到

了当年多次与孙犁先生商讨交流的往事——光阴荏苒，时不我待，当年没时间写，如今退休了，何不借此征文的契机，一鼓作气，完成这部早已酝酿成熟的书稿呢？

动力产生于一念之间，征文一结束，我就开笔了——恰好这段时间，新冠疫情造成社交活动不便，正好提供了一个掩卷闭门的空隙，我每日埋头书海，殚精竭虑，心无旁骛，倾心为文，终于赶在孙老110诞辰之际，献上了一份迟到的敬礼。

鉴于《报人孙犁》(天津人民出版社)是一本以崭新的视角，在世人所熟悉的“作家孙犁”之外，另辟蹊径，重新发现并建构起一个“报人孙犁”的形象，那我就必须为此设定几个重要的写作原则。

其一，我的研究和写作，必以孙老生前的意向为归依，不能随意发挥想象。这个选题，曾得到孙犁先生的首肯和大力支持，其中包括数次长谈、两封长信及多次当面交流，对研究重点和范围已有明晰的界定，我的写作一直恪守这些原则而不越界。

其二，因本书的重点设定为研究孙犁先生的办报生涯，所以，我主动避让了以往文学界专注于论述孙犁文学成就的那些部分，即便是涉及某些具体的文学作品，我也会偏重从新闻的角度，加以新的阐释和论述。譬如，孙犁的名篇《游击区生活一星期》，过去都当作一篇散文，而我则变换视角，将其视为一篇“沉浸式的战地通讯”来发掘其新闻特性；孙犁的《津门小集》以往很少被关注，而我从新闻的视角来观照，则其“渐变式新闻特写”的特色就呈现出来了。角度一变，“报人孙犁”的形象也随之呈现出来。当然，我这样做是由本书定位决定的，并非

漠视或否定孙犁的文学成就。

其三，尽可能从深谈孙犁的原著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同时，不放弃任何与主旨相关的新材料新论点，力求让本书资料翔实丰富，角度新颖独到；当然，我也将自己珍藏的一些宝贵资料，如我珍藏多年的孙犁写给所在党支部的《思想汇报》等手稿，首次在书中披露，使这本《报人孙犁》成为视角独特、资料新颖、特色鲜明、具有说服力的作品。

其四，本书无意写成一本人物专著，也不想写成一本人物传记。我是以轻松活泼的散文随笔形式，讲述孙犁与报纸的深厚渊源，从读报、投稿，到当记者、编副刊、开专栏、培养作者，再到总结新闻理论，阐发编辑思想，成为一个谙熟并介入办报全流程的优秀报人。这些领域，很多都是以往“孙犁研究”的空白点。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填补这些空白，至少是为后人提示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开拓一些新的研究空间。

以上所谈，就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这是需由读者说了算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报人孙犁》2023年5月出版后受到报界同行和各地读者的肯定。此书面世不到半年，各地就告售罄，出版社于11月开机二刷。这样一本“小众读物”，当年出版当年二刷，这说明孙犁先生虽已去世多年，但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依然热度不减，“孙犁迷”是越来越多了。此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目前已有一批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教授，开始对本书进行研究并发表了论文。这说明，我的学术探索也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作为曾经亲炙孙犁先生人格和艺术魅力的晚辈，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欣慰的呢？



长征

第6681期



一视觉阅读

祖国建设需要栋梁材(中国画 上海中国画院藏) 陆伊少作